

「真相」不止一種 ——與「左」、「右」無涉的一種思考

◎ 沈仲亮

《集結號》終於不「吹」了，熱鬧完了，人散曲終。現在我們再來返觀那些熱鬧一時的評論，很多人都給予了影片以熱烈稱讚，但也有些異樣的聲音，甚至在網路上也遭遇了兩種截然對立的評價。褒揚者贊其有著「深刻的人文關懷、獨特的藝術構思、現代的電影語言、真實的歷史場景」，「開創了軍事題材電影的先河」，「吹開了國產戰爭大片的新時代」等等；激烈批評者卻稱其「模糊和抹煞了解放戰爭的正義性」、「淡化以至否定了人民軍隊政治建軍的光榮傳統」、「顛覆了我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等等。在網路時代，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都可能面臨鋪天蓋地毀譽參半的評價，這本不足為奇。但由於《集結號》所涉及的題材、主題的特殊性，於是從這些紛繁複雜的評論現象中，我們也許可以看出一些更有意義的東西來。

有趣的是，褒揚者和批評者都是舉著「還原真相」的大旗來為自己立論的。

在褒揚者看來，馮小剛是在力圖把歷史從革命的宏大敘事中「還原」為個體生命的脆弱與無奈。這也正是馮小剛自己的態度。在2007年12月20日的《南方週末》對馮氏的專訪中，他是這樣來表述《集結號》的：「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我希望我能夠把逼真感模仿過來。在戰爭面前，恐懼和懦弱才是人的常態」、「中國的戰爭片劇本多少年沒有變化，就連《激情燃燒的歲月》、《亮劍》、《士兵突擊》也是強調英雄、集體主義的，石光榮、李雲龍和巴頓一樣，其實都是戰爭狂人，他們喜歡戰場，喜歡戰爭，他們都是好戰分子，過去可以說，他們是用他人的生命成就自己」、「電影裏的人不是自願成為烈士，在被動情況下，他們把命都搭進去了」。在馮小剛及其支持者看來，這才是歷史的「真相」：在戰場上嚇得尿褲子、謊稱聽到號聲以便留下幾個「活種」、被上級「出賣」成為牽制敵人的炮灰、被人遺忘的無數個微小個體的犧牲……而他們要做的，便是「還原」這些「真相」，促使人們重新反思戰爭、反思革命，從宏大敘事的話語圈套中跳出來，去關注歷史中每一個渺小的個體。可以說，其基本立場是一種類似啟蒙話語的反思和批判態度。

批評《集結號》的人，其理由恰是它「扭曲」了歷史的「真相」。在一篇由巍巍等人撰寫的〈我們對電影《集結號》和洛陽毀陵事件的看法〉（巍巍等：〈我們對電影《集結號》和洛陽毀陵事件的看法〉，2008年2月18日，天涯社區）中，稱「廣大觀眾和眾多媒體……尤其是那些從革命戰爭年代走過來的老同志，看了這部片子以後，很是氣憤，批評意見很多」。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形成了一整套光榮傳統。在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和戰鬥員團結一致以及瓦解敵軍等項原則的基礎上，人民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工作，這是我軍克敵制勝，百戰不殆的重要因素。然而，《集結號》的編導們，卻編導了一個毫無根據的虛假故事，否定這些因素和傳統」。這篇文章集中代表了對

《集結號》持堅決批評的聲音，並認為「其性質和事態是相當嚴重的」。

對同一部電影的看法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我看來，分歧的焦點其實在於兩者對於「真相」的理解不同罷了。如果我們堅信「真相」只有一個，那我們恐怕又要陷入一個中國人喜歡習慣性追問的問題——「誰在說謊」，又要在誰真誰假之間做出明確的是非判斷。但如果仔細分析一下褒揚者和批評者的人員構成，會發現這樣的狀況：

褒揚者的隊伍多由學院派的精英知識份子組成，且多為中青年學者，絕大多數應該並未親歷過戰爭。例如，《集結號》的編劇劉恒（全國作協副主席、北京市作協主席、《北京文藝》主編），又如在《南方週末》、《京華時報》、《南方都市報》等媒體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讚頌之詞的評論者。新時期以來，由於文革的直接誘因，對意識形態化主流話語的顛覆漸成潮流，在某種程度上逐漸成為知識份子的一種思維習慣。他們與主流看法習慣性保持距離，對其進行認同式探討抱有下意識的警醒。也就是說，這些學者們在評論社會、文化、藝術等現象時，對舊有或固有觀念已習慣於採用批判性的立場。而「立場」一詞本身就帶有傾向性。這樣一種向度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真相」成為闡釋「立場」的手段，「真相」本身恐怕也會成為被闡釋的對象。

再看對《集結號》持批評態度的人。這裏面也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一批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共產黨軍隊的參加者（如上文提到的魏巍等人，其中包括諸多部隊離休幹部），另一類人是擔心《集結號》會渙散軍心、使百姓對軍隊失去敬意、消解了英雄的品質和行為。我個人認為，後者只是一批對藝術缺乏常識的杞人憂天者，而前者所反映出的意味則更值得去叩問。

作為親歷過戰爭的人，他們理應更有發言權。但在這並非一定要發言的場合，他們發言了，說出的卻是在我們看來太過「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在這種沒有政治壓力情況下，以及從這批老軍人語言敘述的感情上和枚舉的事例上，他們的表態基本可以認為是真誠的。也就是說，在我們看來是令人反感的官方話語，對於他們卻是真摯的心聲，就是「真相」。因此，在他們看來，《集結號》是對「真相」的扭曲，他們有義務「還原」那一代軍人的本來面目。

歷史是無法回流的河水，作為後來者，我們對於歷史的理解只能通過各種各樣的間接證據（如各方的文字文獻、音像資料、親歷者的自述等等）。從現存的很多互補的材料來看，經歷過中國革命的那一代人確實曾真誠地認同或實踐過我們現在抱有警惕的許多東西。但新時期以來，反思之風漸盛，而「反思」是具備一定教育水準的精英才會有的行為。對於老一代軍人來說，一方面年齡的增長放慢了思維的速度，另一方面從前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宣傳又太過堅固，再加上大多數人受教育程度的普遍偏低，「反思」對於他們來說是很難發生的事情。但他們卻有一個優勢，即是歷史的親歷者，他們可以憑藉這個後來人無法具有的「在場」條件，去「自豪」地臧否真假。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事實可能是，那些戰爭年代的許多戰士確實如魏巍等人所說是如此無畏、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不會嚇得尿褲子，不會喊「救命」，也不會試圖臨陣脫逃。

然而，是不是就可以說，這就是「真相」呢？在我看來，可能還不這麼簡單。打個比方：兩個人同時在一條河裏釣魚，一個人可能處於魚群集中的地方，結果是滿載而歸，他會對別人說「這條河裏的魚真多」。相反，另一個人在另一方位卻沒一無所獲，他自然會對別人說「這條河裏的魚真少」。問題來了，到底他們誰說出了人類一直都很熱衷探詢的「真相」？「真相」是複雜的，其中糾織著各種因素和矛盾。馮小剛以為表現出「恐懼」才是歷史的真

實和人的「常態」，殊不知在那個年代，很多人都已是「非常態」的，「恐懼」已被這種「非常態」消解。而魏巍等人很大可能也是說出了一些歷史真實的現象，卻以為這表層的現象就是無法再拷問的全部「真相」。即使這種勇敢和無畏確實是歷史中真實的現象，但卻遠遠不是「人」的真相。也就是說，這種「視死如歸」的戰士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正常的「人」了。他們的「超人」狀態可能會讓我們觸摸到歷史的表面，卻無法詮釋一個「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圍繞這部電影所進行的激烈交鋒，在本質上，我以為爭論的還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用遮蔽、粉飾過了的「真相」去壓制人們還原歷史的努力，那無疑是令人痛恨的。但如果用一種「真相」去否定另一種「真相」，我以為，這是令人痛心的。前者在意識形態更為寬鬆的環境下，在時過境遷之後，通過反思、重評的方式可能會得到反撥，但後者更值得我們去深思。

對此，我沒有開出藥方的衝動。但我贊成對歷史進行不同向度的開掘，這樣可能會整合出一部值得稱信的「歷史」，也可能會還原一種「整體真相」。再接著上文的那個比方：我們完全可以對這條河流的魚群進行一些流域討論，多分分情況，換換角度。或許，還原出「整體真相」本身也是帶有某種烏托邦色彩的假許，但我以為我們不能放棄這種嚮往和追求。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五期 2008年6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五期（2008年6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